

第五屆

卓越新聞獎 得獎作品集

The Excellent Journalism Award, 2006

第五屆卓越新聞獎

平面類國際新聞報導獎

得獎作品：香港專題／中國時報

得獎人：張慧英、鄭漢良、陳一姍

(95.07.17~95.07.21 刊載於中國時報)

目錄

香港專題變遷篇

香港專題特首選舉篇

香港專題經濟篇

香港專題民生篇

香港專題民主篇

香港專題社會篇

香港專題文化篇

九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A 6 香港專題變遷篇

回歸九年 明珠面向中國背對世界

張慧英／專題報導

前言：九年前，英國交出最後一塊殖民地，在自己土地上漂浮了一百五十年的香港，終於重新回歸中國統治。百年的分隔中，香港發展出和中國截然不同的體制與命運，但在「一國兩制」的模式下，一個共產體制和一個資本主義體制，一個獨裁文化和一個自由社會，開始了陌生的融合共存實驗，經歷了一連串的磨合，也開啓了共同的命運。

九年，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差不多已經更替了一個世代的記憶。我們於是覺得，該是好好檢視香港的時候了。

香港回歸後的變化是值得探索的議題，而香港在經濟上日益被中國吸納，東方明珠面臨上海等內地城市的挑戰，曾經獨特的香港似乎開始邊緣化，成長日益依賴內地。這些看在台灣眼裡，格外感同身受。但生存能量強大的香港，面對中國崛起的強大衝擊，全力掌握機會自我蛻變，卻也為自己開創出新的空間。

本報特派記者張慧英、陳一珊、王爵暉於六月下旬來到香港，連同本報香港特派員鄭漢良，從政界、學界、財經界、旅遊業、文化界、新聞界訪談到十幾歲的小朋友，也到深圳走訪香港與內地在生活上的緊密互動，發現這是一段非常特別的發展過程，而且對台灣更有特別的對照價值。本報自今天起推出系列香港專題，為讀者提供一個全面而深入的香港圖像。

還記得英國的殖民嗎？

被問到這個問題，十四歲的梁俊傑點點頭。咦？當時他才五歲，記得什麼？他掏出幾枚硬幣，找了找，挑出一枚暗紅色的五毛，秀出上面的女王頭。這是英國在香港一百五十年殖民的最後一抹餘暉，已經很陳舊了。

經濟依賴中國 獨特性漸喪失

跨入七月，「一國兩制」在香港也邁入了第十個年頭，這段過程風雨起伏，但走訪香港後發現，其實「一國兩制」已經愈來愈不重要了。不是五十年不變跳票，而是世事難料。香港已經變了：獨特性逐漸褪色，經濟上依賴中國，生活上與內地密切整合。然而在政治上，卻隱隱積累著緊繃。

大致而言，中共對香港內部事務相當克制，不明著強硬干預，而是採取細膩的「以商圍政」統戰手法，一手軟一手硬。加強香港人對祖國的了解與認同，佐以實質利益為誘因，同時阻擋民主改革。過去香港引以為傲的自由、法治及清廉，大致來說，並沒有看見北京主動伸入的手。不過，風氣和觀念的滲透是無形的，「工商界和政府的關係沒以前那麼嚴格遵守利益迴避，香港人開始覺得，廉政在工商界這方面已經下降了，」《明報》政論專欄作家洪清田指出，「這被形容為『耗損』，賺內地公司的錢一定會引進污染，問題是怎麼維修這套機器。」

香港人深受「兩『民』心態」影響——難民與殖民。

幾代人都是流亡避禍而來，香港只是個喘息兼搶錢的跳板，一切以切身利益為考量。英國人訓練了香港人做事的手，卻呆滯了他們思考的腦，沒有為他人及家園付出的道德價值。社福不錯、免稅或低稅，和大陸



下一步怎麼走？

▲回歸中國進入第10個年頭，香港人努力建立的新國家認同與民族意識，珍惜英國人留下的法治基礎與一國兩制的特殊待遇；在面對「長三角」與「珠三角」虎視眈眈，東方明珠如何保留獨有的世界貿易中心地位，走出下一步，是當代香港人所必須思考的嚴肅課題。

(王蔚攝)

比已是天堂，所以很習慣做順民，沒有自己是這裡主人的認知。

融進中國 又要避免被邊緣化

作家龍應台感嘆說：「殖民帶來現代化，但剝奪的東西是看不見的，包括感情、智慧、對自己的掌握、對未來的集體願景、人民與土地的關係。」「我以為九七後會對這種心態作出清洗、挑戰、訂正，但沒有發生，只是換個殖民者而已。」

在現實心態下，大談愛國、把中英文學校比例翻轉、媒體觀風向自我約束、對北京詞彙牙牙學舌的一些表態動作，都可以想見。但內外大環境變化之巨，卻是誰也沒料到的。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指出，九年來，所有過去顧慮的都不成問題，冒出來的都是新問題，「現在是怎麼融進中國而不被邊緣化。」

回歸後的社會融合明顯可見。移民落跑的人漸漸回流，和內地加速融合，普通話日益流通，人民之間的互動頻繁，移居、就學、就業、通婚者迅增。可惜這些年裡運勢有點背，先後經歷了金融風暴、全球經濟衰退、SARS、產業轉型等衝擊，貧富兩極化加劇。加上董建華政績與人氣都差，搞得民怨沸騰，不敢對北京發的氣全出在董建華身上，以致於中共必須掏錢以商護政。「我們體系小，中國這個龐然大物，幾個動作問題就解決了。幾家公司來上市，稅收就可以沖掉香港大部分赤字。」葉國華說。

生活雖融合 政治上卻蓄積不滿

人窮志短，精品店裡擠滿了撒錢不眨眼的大陸客，香港人卻到深圳採買廉價日用品。「香港人現在懂得謙虛了，知道我們只是一個大體系中的一個小體系」，政策研究所助理鄭偉鳴坦承：「最初我們是有看不起同胞的殖民心態，但天天跑中國的人都慢慢感覺到，香港其實是微不足道的……我們現在沒那麼囂張了。」

祖國慷慨相救、大陸商機蓬勃、中國的國際地位提昇，都增加了香港人對祖國的信任與認同。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民調專家王家英教授指出，四月最新數據顯示，香港民眾對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表現滿意者五十一%、信任中央政府者五〇·七%、對大陸經濟前景樂觀者八二·九%，均創下調查以來的新高。

然而，在生活融合、經濟扶助的同時，政治氣氛卻漸漸沉積著不滿，最主要的衝突點還是普選。

基本法明定依特區實際情況循序漸進達成普選，但中共愈來愈不願實踐這個承諾。人大代表李鵬飛表示：「香港的民主化，中共是不放心的，因為民選的特首會以人民的意見為依歸，如果與中央政府有衝突怎麼辦？不過也不能怪中共，他們怕失控嘛。」

再回頭看，中共可能很後悔當初把最終達至普選寫進基本法，搞到現在尾大不掉。港人認定普選是自己合法應得的權利，加上外有台灣總統直選和全球民主浪潮，內有董建華凸顯欽定的壞處，因此對普選的要求是全面而堅定的。偏偏北京堅持阻擋，連個時間表也不肯給，導致民衆的不滿逐漸堆疊深化，從老到少，成了全民共識。

風華不再

► 炫麗奪目的維多利亞港夜景，象徵著香港五彩繽紛的東方魅力與永不停歇的生機活力。

(王蔚輝攝)



示威抗議增加
回歸後新現象

於是，有史以來，香港人第一次擁有一個

共同的政治目標，而且是一個有驅動能量的目標。就政治發展而言，這已經是非常大的一個起步了。

經熱政冷，也反映在民調中。認為回歸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有落實的三九·二%，沒有落實的一七·六%，認為「普通」的高達四一%，王家英指出，主要就是因為普選沒有積極推動，港人覺得中央不信任香港，心中是有不滿的。

回歸後另一個新現象，是示威抗議活動明顯增加，民間力量、社團、網路串連逐漸萌芽。被城市大學教授李金銓形容為「在錯誤的時代挑出錯誤的人」的董建華，上任後大搞新政，因此一下子冒出很多爭議事件，例如數碼港、西九龍計畫、添馬艦政府總部工程等。

但對於外國主子和自己人領袖，民衆的期待是不同的。以前英國人分配利益拉攏上層、再以社會福利照顧下層，即使獨斷也不致受到挑戰，但現在民衆會質疑決策的權力基礎，並且提出挑戰，使得特區政府比以往瞻前顧後。所以，董建華製造了很多機會，讓香港人學習並練習以民意影響決策。

運轉中心地位 遭空前挑戰

但直到廿三條的衝突，香港人最呵護的核心價值才真正浮現。港大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陳祖為指出，「香港人不是以土地來表達對社群的感情，而是認同這裡的生活方式、價值觀、效率、自由、法治、公平與勤奮等無形的東西。」北京想像不到一個沒有「顛覆罪」的社會對廿三條的恐慌，因它會顛覆掉整

個社會最珍視的核心價值與生活方式，這是兩種思維程式、兩套文明的直接對撞。

香港人從來沒有民主，只靠自由與法治保護自己，這是他們必須死守的最後堡壘；殖民者沒有耕耘民主，但法治、自由、人權等觀念，已經內化成港人的思維模式與核心價值了。

這場對撞，導致○三年七月一日五十萬人上街，是百年史上因為內部管治問題最多人上街的一次。結果，依基本法第廿三條提出的國安法草案就此擱置，北京也終於決定換掉董建華，代以長期在港英政府擔任公職的曾蔭權。

在巨變中 站穩位置尋找機會

現在香港太依賴中國，很多人擔心「東方明珠」將日益暗淡。公民黨黨魁余若薇感嘆，「以前香港是面向世界背對祖國，現在是面向祖國背對世界。」的確，香港正被迅速吸納為珠三角經濟體的一部分，往昔的獨特角色已然降低，運轉中心的地位遭遇深圳的嚴峻挑戰，但這些其實都與回歸無關。以中國崛起之勢，亞洲沒有一個國家能置身其外。就成長變化而言，大陸甚至比香港走得更快。

香港向著中國融合，中國則向著世界融合。香港是進步、還是退步了，必須放進整個中國的路徑裡判讀。回歸前，香港預想不到今天的局面，未來的變化更將超越今天的想像。在中國巨變的浪濤中，香港只能盡全力站穩位置，並且一如以往地，尋找對自己最有利的機會。

廉政公署形象 不再超然

鄭漢良／報導

「香港好在有 I C A C」。這是廉政公署的形象廣告口號，反映了廉署在香港崇高與超然的地位。但自回歸以來，這個當年只向港督負責而現在則向曾蔭權報告的廉署，卻受到外界不少的批評，有評論甚至形容廉署已經淪為政府剷除異己的秘密警察。

最近引發社會激辯廉署角色的事件，是有廉署剋星之稱的律師林炳昌和艾勤賢因妨礙司法公正，遭到廉署檢控判刑。此案受到外界注意的地方在於，他們十多年來與廉署在法庭上交手多次，在多個重要案子中打

敗廉署使被告脫罪，林炳昌更曾揭發廉署調查手法違規，兩人入獄，有評論指出這是政治介入的結果。

曾是公務員的學者王岸然在《信報》撰文指出：「事件顯示，特首直接涉及案件之中，而且不是一位特首，還包括前朝的董建華。憲制上能干預廉署工作的就只有特首，但兩任特首不單不負起監察廉署，防止其濫權的責任，反而故意配合，為的是什麼？」

在董建華首屆特首任內，有「鐵蝴蝶」之稱的任關佩英率領廉署搗破了《星島》報業集團老闆胡仙涉虛報銷路案，但董建華的下屬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卻以公眾利益為由拒絕起訴胡仙，決定引起社會嘩然。與胡仙私交甚篤的董建華更是將任關佩英另調部門，公正不阿的「鐵蝴蝶」被迫黯然離開公務員生涯。

之後，地位顯赫的廉署首長，不能說是一蟹不如一蟹，但起碼任期幾乎一個比一個短，不難看出廉署的地位和角色，在港人治港的當今政治環境下，變了甚麼模樣。

香港回歸九年大事記	
	1997.7.1 香港回歸中國，董建華出任特區行政長官
	1997.10月 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房市大跌
1998.5月	立法會議員選舉，廿席直選議席中，民主派當選十四席
1998.6.10	恆生指數跌破8000點，政府隨後推出振興經濟措施
2000.9.10	立法會議員選舉，廿四席直選議席中，民主派當選十二席
2002.3月	董建華再度由選舉委員會選為特區行政長官
2003.3月	爆發SARS，三個月內死亡296人，經濟損失達數十億港幣
2003.6.29	中國與香港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開放自由行
2003.7.1	五十萬人遊行，反對第七三條立法
2003.9.5	特區政府撤回依基本法第七三條制定之國安法草案
2004.1.1	十萬人遊行，要求「選政於民，普選特首」
2004.4.27	中共人大常委會否決07年行政長官、08年立法會全席普選
2004.7.1	五十萬人遊行，要求「一人一票選特首」
2004.9.14	立法會議員選舉，卅席直選議席中，泛民主派廿三席
2005.3.10	董建華請辭行政長官
2005.4.27	中共人大常委會通過釋法，確認新特首任期只有兩年
2005.6.16	曾蔭權當選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2005.10.8	特區政府推翻備受爭議的西九龍案，提出新方案
2005.10.20	特區政府提出07、08選舉政制改革方案，未獲立法會通過
2005.12.5	廿五萬人遊行爭取普選

九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A 7 香港專題特首選舉篇

特首熱身戰 假民主真權鬥

鄭漢良／特稿

陳方安生與曾蔭權最近之連串交鋒，對期盼香港民主的人，這是特首選舉的熱身賽，但對香港左派人士而言，可能只是一場窩裡反。

挑戰曾蔭權 陳方安生來勢洶

他們兩個都是港英時代的高官，爲了穩定香港十八萬公務員，而在九年前回歸的重要時刻，同時獲得留任，輔佐新主董建華。

身爲一人之下的政務司長陳方安生不但一直都得不到北京的信任，而且還經常需要應對香港左派的攻擊，終於在二〇〇一年下堂求去。她的下屬曾蔭權雖然在財政司司長任內，因擊退國際股市和匯市炒家而聲名大噪，因此榮升陳方安生的舊職，但也同樣敵不過左派的圍剿而遭董建華政府的冰凍。但人生際遇無常，二〇〇三年五十萬人反二十三條、反董建華、反官運正隆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使得曾蔭權成爲北京新主人胡錦濤在香港唯一的選擇，在二〇〇五年接替宣稱因腿疾而提早辭職的董建華，成爲特區政府「第二屆半」行政長官。



長路漫漫

▲香港特區政府議會政治流於形式。（王蔚攝）

走上街頭

左派批陳紅杏出牆

離開官場的陳方安生一直都保持相當的低調，本報記者屢次企圖聯絡她，也只能透過她唯一有職位的聯合國兒童基金，但她卻經常透過外國傳媒放話，畢竟她的新頭銜「香港良心」也是外國媒體率先冠用的。但從去年曾蔭權成爲特首後，陳方安生對政府的批評稍微見諸香港報端，例如她批評政制事務局局長林

瑞麟自稱局長問責制運作良好是「自欺欺人」，到了去年年底她更因爲反對曾蔭權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而參加示威遊行，轟動香港，左派人士用盡一切難聽的話抨擊她，甚至說她「不安本份、紅杏出牆」。

也是合該有事，今年新上任的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宣稱是爲了公眾利益，將一宗涉及陳方安生胞兒女朋友多

年前死亡的案件，翻案重審。結果雖同樣是不了了之，但案件受到左派報章巨細無遺的報道，讓方家出盡洋相。

權力之爭 獲得選委連署不易

曾蔭權今年在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更露骨地指責陳方安生不在其位卻仍謀其事，他說：「我退休後會選擇離開香港，以免對繼任人阻手阻腳。」陳方安生則「碰巧」在此之後，批評政府更是不遺餘力，例如在今年七一爭取民主大遊行前，公開表態呼籲市民挺身出來，一副豁出去的姿態。

陳方安生曾批評曾蔭權沒有盡力向北京轉告香港人對民主普選的訴求，但輿論同時也批評陳方安生過去多年來在政府位高權重，同樣沒有為香港的民主公開表態，認為陳方安生與曾蔭權之爭，其實只是權力之爭。

不少人相信陳方安生這次高調參加七一遊行，是為了測試競選特首的水溫，但正如《基本法》制訂的選舉辦法，陳方安生要取得一百名選委的連署，並非易事，而且這八百個選委中，大多數都以北京的臉色行事，至於有多少人上街遊行，不是他們所關心的事情。

「香港良心」不敵北京臉色

張慧英／報導

下屆特首選舉會出現「煲呔」大戰「陳太」嗎？

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喜歡打領結，向來有「煲呔曾」(bow tie) 的外號。香港人沿英習，已婚婦女多冠夫姓，被譽為「香港的良心」的陳方安生，則被稱為「陳太」。陳方安生近來對政改頻頻提出批評，並且參與七一遊行，她是能集結民主派人氣、挑戰曾蔭權的領袖嗎？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教授王家英用台灣政治領袖來比喻，他表示，陳方安生有點像馬英九，乾乾淨淨的，從來都是菁英階層，可以得到中產階級的認同，但和基層民眾比較脫離，連參加遊行，她都是一身名牌，且只走一小段路。曾蔭權草根味較強，出身清苦，努力上進，行政能力強，現在更勤於耕耘基層，每星期都去民眾家中拜訪，有點像宋楚瑜或李登輝。

港大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陳祖為認為：「曾蔭權一出來，香港的民主就難發展了。」因為港人覺得領導人的能力最重要，是不是經由民主程度產生還在其

次。

現階段，香港民眾並不打算推翻北京欽定的特首人選。民主黨主席李永達指出，即使能夠普選，香港選民也會選「現實的」候選人，因為大家不希望中港關係太緊張，如果是中央政府不接受的人，就不可能當選。

其實，北京也不會亂點，還是會挑一個香港民眾接受的人。既然如此相互體諒，曾蔭權又十拿九穩，還怕

改為普選嗎？人大代表李鵬飛表示，其實曾蔭權不用中央支持也能當選，但北京還是不放心，套句英國人的老話，「中共也有選舉，但選前要知道結果。」

《明報》政論專欄作家洪清田的比喻是：「這就和教廷跟中共爭主教任命權同一個性質，重點在誰是皇帝。」

《小檔案》角逐特首 須百名選委連署

鄭漢良／報導

根據《基本法》的附件一，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八百人選舉委員會選出，由中央政府任命。選委會組成架構包括：工商、金融界二百人；專業界二百人；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二百人；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代表二百人。

至於各個界別的劃分，以及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產生選舉委員的名額，由特區根據民主、開放的原則制定選舉法加以規定，各界別則根據選舉法規定的名額和選舉辦法自行選出選委會委員。

於是這八百個代表的產生各自不同，有些需要得到數以千計的選票方可勝出，例如屬於民主黨選自教育界的張文光，有些則因為沒有對手根本不需選舉就可以自動當選，例如霍英東之子霍震霆。有些人因為地位顯赫而可以遊走不同界別目的就是當選，例如李嘉誠次子李澤楷，即以理工大學校董身分從教育界獲得一個席位。

要選特首門檻甚高，特別是需要一百個或以上的選委連署，才具候選資格。連署等於記名投票，不少選委就算不喜歡欽點的候選人，但礙於連署規定，以免今後遭到親疏有別的后後算帳，想想還是算了。這就是陳方安生就算有意出馬，要取得提名資格也非常困難。

專訪政制局長林瑞麟 雙普選呼聲高 只差臨門一腳

張慧英／專訪

近年來，香港民眾要求特首及立法會全面普選的呼聲日益增強，香港特區政府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指出，在實現普選的過程及制訂普選模式時，必須貫徹四項原則：社會各階層利益、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循序漸進及適合香港實際情況。

選制改革無時間表 未能通過

特區政府去年提出○七特首、○八立法會選舉新辦法的〈政制發展方案〉，但民主派認為開放幅度有限且未提普選時間表，該草案因而未獲通過必須的三分之二多數。林瑞麟是規劃選制改革的重要負責官員，也兼司台港關係，以下是專訪內容：

問：依據《基本法》提出的〈政制發展方案〉去年未獲立法會通過，是否將修正後再提交立法？功能界別議員比例及特首選舉方式將作那些修正？

答：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制一直按照《基本法》向前發展，目前的安排比回歸前開放及更具民主成份。

現時，行政長官是由選舉產生，而負責選出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有八百名委員，當中包括所有民選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方面，由地區直選產生的議席數目一直增加，由一九九八年的廿席，增至二〇〇四年的廿四席，及二〇〇七年的卅席(即半數議席)。

為了增加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的民主成分，特區政府去年提出了二〇〇七／〇八年選舉方案，建議讓全港五百多名區議員參與行政長官選舉，當中四百名區議員是經直選產生。方案亦建議在十個立法會新增議席中，五個是地區直選議席，五個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是由區議員互選產生；即接近六成的立法會議席，由三百多萬名選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

兩案修正辦法 六成民眾支持

在去年立法會就方案作表決前，根據不同的民調，有約六成市民支持方案。在立法會內，方案亦得到過半數議員的支持。根據《基本法》，兩個選舉辦法可以進行修改，也可以不進行修改。由於未能得到所需的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在現有法律框架下，〇七／〇八年兩個選舉將會在現在安排的基礎上進行。就二〇〇七行政長官選舉，我們已完成有關本地法例的技術性修訂，正為有關選舉作準備工作。

問：「雙普選」獲得民意普遍回響，但有關雙普選的實施進度，特區政府與民主黨派意見不盡相同，未來將如何廣納各界意見並與各黨派溝通？

答：特區政府非常明白市民對普選的訴求。事實上，根據香港浸會大學最近所作的調查，五成市民認為反對派應為立法會未能通過方案負上責任。

行政長官率先於去年十一月透過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展開有關普選路線圖的討論。委員會的成員來自社會不同界別，包括專業人士、學者、商界、不同政黨的成員、立法會議員、勞工界和傳媒。此外，政府官員亦有出席立法會的會議，聽取不同黨派的議員對相關議題的意見。

貫徹四原則 兼顧各階層利益

經過半年詳細討論，委員會就普選的原則和概念的討論作出了總結。總體而言，委員認同在達致普選的過程當中，以及在制訂落實普選的模式時，須確保貫徹以下四原則：(一)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三)循序漸進；(四)適合香港實際情況。

策發會將於今年七月下旬開展有關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可能模式的討論，目標是於明年年初為討論作總結。特區政府會向中央反映有關的總結，並希望能與中央建立一個更廣闊的基礎，讓大家可以探討如何落實普選的最終目標。

問：未來繼續推動政制改革，將面臨那些挑戰？

答：未來幾年，香港會有機會再討論這兩個選舉制度如何進一步發展。屆時，我們須面對的一項挑戰，是如何在社會建立共識。去年，我們只差一小步便能達成共識，帶領香港向普選邁進一步。我們希望不同黨派能汲取○七／○八年選舉方案的經驗，求同存異，建立共識，香港政制才可有望取得進展。

策發會委員認同普選會影響功能界別的既得利益，要落實普選，必須爭取到立法會卅名功能界別和卅名地區直選產生大部份議員，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認同和支持。因此，社會各界須願意接受一個能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政制發展方案，才可有望取得進展。

問：普選將於何時實施？

答：香港將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達致最終普選的目標。

加強台港關係 樂見兩岸三通

問：香港與台灣之間，有那些合作關係可以加強？

答：香港特區政府一直都積極推動香港和台灣的交流活動。我們主要工作目標，是積極推動港台間的經貿往來及文化交流，並在適當情況下，向訪港台灣人士簡介香港的最新發展和落實「一國兩制」的情況。

我們在香港非常看重對台的關係，台灣已經連續多年成為香港第四大的貿易夥伴，我們期望兩地的經濟合作能繼續加強。同時我們也歡迎「兩岸三通」的全面實施。雖然短期來說，「兩岸三通」或許會對香港一些行業造成影響，但隨著兩岸的合作增加，必定能帶動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長遠來說，兩岸三地在經濟上均會受惠。

除了經濟合作之外，我們歡迎台灣人士來港訪問、工作或生活，親身體驗「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自二○○二年三月引入網上快證(i-Permit)計劃後，台灣旅客來港觀光比前更加方便，至今我們已發出了超過九十三萬張網上快證。根據我們剛剛在六月份宣佈的新入境措施，今後持有台胞證並有效簽注的訪客，可以免簽證在香港逗留七天。我們相信，這些新措施都能便利台灣人士來港，加強兩地交流和合作。

第五屆

卓越新聞獎 得獎作品集

The Excellent Journalism Award, 2006

此外，我們也透過非官方機構和民間團體加強與台灣民間的各種交流。我們有邀請不同界別的台灣人士來港參加交流活動，讓他們認識香港。過去幾年，我們接待了多個來自台灣的參訪團，包括台灣新聞界、工商界、學術界及法律界等。近年來，我們對港台交流都抱著開放的態度，接待了不少來自不同黨派的立法委員，包括藍綠陣營及台灣不同市政府的代表，例如台北市議會等等。我們會繼續加強這方面的交流。

九十五年七月十八日 A 6 香港專題經濟篇

金融觀光外 尋經濟第三支柱

陳一珊／專題報導

七一，香港回歸中國大陸走入第十個年頭，距離「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歲月已經過了五分之一。

當台灣還忙著對香港「一國兩制」的名詞進行研究，香港已經靜悄悄地換了一個檔次。政治上，一國兩制已經像空氣一樣，香港社會早不談了；經濟上，香港也完完全全成為「一個中國的香港」。「我們都知道

這遲早會發生，但沒想到速度這麼快，」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說。



睇著商機「錢」進

▲香港國際機場每天近千架次起降的航班帶來商機無限，隨著大陸成為世界工廠，當日往返內地的頻繁班次，更造就一批逐商機而居的新興游牧民族。（王鈞攝）

加入WTO 加速中港整合

「研究香港已經不能不研究大陸，」高盛香港經濟分析師馮殷諾指著數據說，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產業結構相加，就是一個正常的經濟體，香港負責提供服務業，廣東負責製造。去年，北京人民代表大會第十一次五年計畫，第一次把香港行政特區列入規畫，象徵意義十足。

當台灣老是把焦點集中在自由行與CEPA，繞著政治動機打轉，實際走訪香港卻發現，這兩大利多功能有限。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呂大樂說，其實CEPA只是讓香港人比外人早兩年進去大陸而已，但大陸市場不是跑進去就會成功。對於專業人士，醫生、會計師到內地如果收費跟當地一樣，就沒有意義，但如果需要香港更好服務的大陸人，現在都直接飛到香港來，也不需要到大陸去執業。「只是心理效果，不覺得有什麼具體作用，」他說。

相反的，幾乎一致公認，真正加速中港經濟整合的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與全球經濟整合的大趨勢。馮殷諾就說，中國加入WTO之後，開始逐步開放，加上中國企業快速成長、外匯存底增加，中國要往外走出去，開始需要香港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之前是單向，整合並不完全，現在是雙向」他具體地說。

內資挹注下 金融中心質變

在大陸內資的灌注下，香港金融中心面貌產生極大的轉變。傳統上，香港股市本地金融占二成三，地產股

最大宗佔三成。隨著大陸四大國有銀行、大型企業在港掛牌，今年四月，金融股比重已高達三五・六%，而包含聯想、中海油在內的產業股已增加到一八・四%，昔日明星—地產股降為一一・五%。

寶來證券香港分公司副總經理歐宏傑發現，H股成交量已高達總體四到五成。香港恆生指數順應這樣的變化，九七年時只有三檔大陸股票，比重二%，如今已增到十檔，比重竄升到三一・三二%。

以英文為母語的全球前五大投資銀行，香港業務有七成與大陸有關，這兩年起，就連僱用大學畢業生也要會說普通話、會中文打字。普通話不流利的助理，起薪硬生生就得打七折。

是特色？還是依賴？不同於台灣對於大陸又愛又怕，在租來的土地、借來的歲月中長大的香港人，習於這種不穩定結構，展現一種自知的現實感。

渣打銀行東北亞首席經濟分析師關家明就說，用依賴這個字眼不對，香港與中國之間是雙向互惠。外界覺得沒有中國遊客，香港就死定了，事實上香港全世界都可以來。C E P A 反面來說，是中國以香港做開放試點，不開放對大陸的損失，比對香港還大。「依賴任何一國都有風險，今日香港吃大陸重一點，未來誰也不知道，」他說。

但香港人是有準備的，不論是兩岸直航，還是上海崛起對香港的衝擊，關家明說，香港人最怕的不是競爭，而是沒有競爭，「因為生活太好，就跑不動了，」他形容。

以殖民血淚換來的法治與文官效能，是香港人最倚賴的自信。除了對基本法意見紛歧，在商業領域的執法上，九七後香港並未退步。相反的，譬如證交法就還因應後安隆案後的世界潮流，快速立法。

富邦港基銀行總經理李晉頤觀察，香港自由，外界以為政府什麼都不管，其實香港金融監理的強度超過外界的想像。每日他與香港金監會電話往來不下三、四通，原因是希望讓銀行了解金監會在意的重點，以提高效率。

看重法治是香港的社會共識。香港大學教授呂大樂說，香港人認為，香港已經沒有民主，法律是保護香港唯一的方法，因此絕對的法治，反對貪汙就像天條。以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為例，這位家財萬貫的投資銀行界金童，就因為在宣布車輛加稅前，幫即將臨盆的太太買了台車，被香港社會批評為自肥省稅二十萬，最後辭職下台。

轉型未成 人們看不到未來

一個中國的香港，讓中環行走的光鮮銀行家們再度恢復神氣；股市回升到九七年前水平，中午的餐館開始要先預約，以免向隅。不過經濟學中，貿易完全流動所導致的要素平均理論也在香港應驗。

港去年平均國民所得二萬五千五百美元，約一六六萬港元。但薪水最低的清潔工去年平均月薪約五千港幣，年薪才六萬港幣，比九八年少了一成二。

不僅是教育程度低的人，曾經出版「中產好痛」一書的呂大樂說，即使是中產階級，也還是覺得經濟轉型未成，看不到未來。全世界覺得香港好的，大概只有經濟狀況更不好的台灣人。根據香港政府統計，香港中級經理人薪資一九九九年後平均每年下跌○·七五%，去年才稍微回漲○·四%。

一位銀行家認為，香港經濟最大問題，在於除了金融、觀光外找不到第三根支柱，長期有社會底層的一群人無法參與經濟發展，是香港最大的問題。

香港經濟轉型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在香港已經十五年的聯合出版集團總經理趙斌觀察，長期以來，香港社會就把賺錢當成主流價值，這種一面倒的價值觀，讓香港人力資源不平衡到某種地步。長期因為金融與房地產賺錢，下一代價值觀全部偏金融與房地產，全部都投入同一個行業，更加強化行業的不平衡，導致整個城市產業完全無法轉型。

貧富差距大 更進一步惡化

最諷刺的例子，就是前特首董建華原本想要仿效台灣科學園區，提出的數碼港計劃。結果地產大亨李嘉誠新建的數碼港，只有辦公大樓、高級住宅，沒有數碼(高科技)，成為香港笑話一則。

結構加上經濟整合巨浪，貧富差距是已開發地區裡最嚴重的香港，所得差距正進一步惡化。敏感的呂大樂說，人窮氣短，香港與內地的相對關係早已發生巨變。就像香港先台灣一步製造業外移一樣，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這些事都會發生在台灣。

危機感 撐起轉運中心競爭力

陳一姍／報導

從天俯瞰，建造在海埔新生地上的赤(ㄉㄩˇㄥˋ)角機場，就像是一隻停在蕞爾小島邊的大老鷹。與天爭地，就像香港的宿命，永遠在危機感中撐大自己的競爭力。轉運中心正是香港宿命與競爭力的顯影。

在珠三角，深圳、珠海、廣州、澳門四個國際機場，讓赤(ㄉㄩˇㄥˋ)角機場腹背受敵。而車程只要一小時的廣東蛇口港，也與香港正面衝突。但去年客戶數高達四千萬、貨運量成長一成的香港機場，繼續第五年拿下全球最佳機場。香港港口的貨運量，也一直維持在亞洲前兩名的地位。

強烈的危機感，是香港轉運中心競爭力的來源。待過洛杉磯、紐約的華航香港分公司總經理姚都生說，香

港機管局的危機意識很強，會不斷推出新的便利方案，穩定中轉的客源。譬如：爲了吸引珠三角的旅客，在機場建了一個少見的海天碼頭，讓福永、虎門、中山、蛇口與澳門的旅客能直接搭船，避掉長達兩小時的陸運塞車時間。爲了增加旅客搭船的意願，香港機管局甚至說服蛇口碼頭，讓華航、國泰及港龍等航空公司在蛇口搭船時就能跨境預辦登機，行李一運到底。也因此飛翼船開辦才短短兩年，華航在海天碼頭的客人已有約五分之一是搭船來坐飛機。

不僅是服務，香港也參與珠三角、杭州蕭山機場的營運，來維繫自己的競爭力。一位航空公司負責人推測，由於大陸國內線班機非常便宜，從上海飛珠海，再用海運轉香港的票價，還不到上海飛香港的一半。香港極有可能透過這樣的佈局，讓內地旅客還是願意到香港轉機。配合香港最頻繁的國際航線班次，雙重鞏固香港國際機場的國際及地區航空樞紐的地位。

「香港機管局處處動腦，如何把經過香港旅客人數弄大，」姚都生也認爲。

台灣普遍認爲，只要兩岸直航，香港必定受到很大的影響。諷刺的是，就在陸委會宣佈包機直航的同時，長榮航空差不多同期卻在香港開設華南貨運中心。長榮航空香港分公司總經理林志忠解釋，之所以如此佈局，是認爲兩岸直航影響有限。兩岸班機，一下子不可能密集如台港，香港還是有一定的機會。而香港去年底開始態度一改，長榮申請加班機幾乎都准，讓整個貨量穩定下來。一家運輸業者觀察，這樣的改變，其實是香港在預作兩岸三通的準備，香港機管局希望拉住台灣航空公司飛到香港來，才不會被邊緣化。

在香港，沒有人否認香港轉運中心能繁榮多久，的確要看廣東港口與機場未來的發展。但香港人拒絕束手就擒，最起碼，他們會在大陸崛起之前，先做好共存共榮的布局。

專訪匯豐銀行大中華經濟學家梁兆基：

香港蛻變 「資產管理中心」角色崛起



▲梁兆基認爲，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容易被取代。

(王爵暉攝)

陳一姍、張慧英／專訪

匯豐銀行大中華經濟學家梁兆基指出，香港藉著中國經濟成長之勢，已經把握機會蛻變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而這正是將來需要的，因此他對香港的信心比以前更強。以下爲專訪紀要：

與中緊密結合 開啓雙向流通

問：九七回歸已經進入第十年，香港經濟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答：應該是香港與中國經濟整合更完全了。兩大原因，一是九七亞

洲金融風暴，二是中國加入WTO後經濟崛起得更快。九七以前，香港與中國經濟整合過程是不完全的，資金只是單向中國流出，香港只有空洞化的故事。金融風暴讓外資撤離亞洲，雙重打擊讓香港看起來更嚴重。二〇〇三年以後，中國的自由行等開放措施，讓內地朋友帶很多資金到香港，開啓了雙向流通；外國投資人看到香港有些希望，中國也慢慢開放了，認定發展方向已經形成，再來只是時間問題。只要有希望，外面資金就會湧進香港，所以香港反彈得很快。

問：與中國如此緊密整合，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會被內地城市取代嗎？

答：發展金融中心不是那麼容易，香港地位不會很容易被取代。香港經過許多金融中心的挑戰，之前是新加坡，現在又說上海、杜拜，但你只要看現在可以稱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也只有紐約、倫敦、香港與布魯塞爾，甚至連東京都不是。

不憂港幣前途 50年以後再說

而且除了發展成內地國有企業融資中心，香港一個新定位是亞洲私人銀行總部。二〇〇三年以前，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在新加坡，但現在內地慢慢開放，財團都逐漸轉移到貸款、資產管理、交易中心等業務，讓香港資產管理中心的角色開始崛起。香港金融中心的成分已經改變，而且正是將來需要的！

要管理這個區域內、特別是內地的資金，那有地方比香港更好？只要我們的人才、法律制度、基礎建設與



跟著世界運轉 ▲和記黃埔國際貨櫃碼頭是香港最繁忙的集貨箱轉運站，來自全球每天數千個貨櫃都須經過這裡，再轉送到世界各地。（王蔚暉攝）

產品，跟紐約、倫敦一樣是國際水平，內地資金出來會選香港做第一站。我對香港的信心比以前還強！

問：匯豐是港幣主要的發鈔銀行，您怎麼看港幣未來的前景？

答：港幣的前景，我並不擔心。第一，港幣是完全可以兌換的貨幣，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人民幣仍不可能完全兌換。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如果不能自由兌換，資金就不可能自由。香港沒那麼笨，不要金融中心，只要人民幣。香港不是不愛祖國，只是人民幣目前沒有這個條件。第二，港幣是法庭上唯一承認的法幣，基本法允許港幣存在五十年，不論人民幣如何，港幣從一九九七開始，起碼會存在五十年。港幣未來不用擔心，五十年後再說。

兩岸多些交流 對台灣有助力

問：台灣是否可從香港經驗借鏡？

答：兩岸多些交流對雙方都好，在全球化的情況下，已經不能把自己關起來了。雖然政治層面有些麻煩，但從經濟角度看，加強兩岸交流對台灣經濟成長將是很大助力。香港就是很好的例子，重點不在自由行，而是看到有樂觀的希望時，外面的投資就會慢慢回來。投資是每個經濟成長的動力，今天沒有投資將來怎麼會有成果？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五年，台灣投資成長平均是〇%，將來沒有希望嘛！

要如何重新吸引投資？台灣要給人希望，如果台灣開始轉型，在大中華區有自己的角色，人家就會願意投資了。台灣有很多人才和國際級的創新科技，研究成果內地都還做不到，但就是沒有投資，不是台灣沒資金，是外面投資不進來。

用「心」看自己 放眼全世界

陳一珊／報導

聽到《中國時報》派三個人到香港採訪九天，所有人的第一反應都是「這個地方有什麼好採訪的」。台灣人似乎過於熟悉香港了，一國兩制、自由行、C E P A，香港不過是仰北京鼻息的小可憐蟲。

然而當我們帶著題目去問香港人，C E P A帶來多少利多？香港人卻跟你談，二〇〇三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融入全世界，香港如何做中國經濟走出國際的窗口。香港人很清楚知道，跟自由行、C E P A相比，這才是無可逆轉改變全世界的潮流。因為這個改變，經濟融合已從單向的空洞化，變成雙向、比較利益的產業分工。

香港人跟你談著如何從國際大潮中，擷取香港的利益；但他們心知肚明，中國一切的開放，全是基於自己的利益、有著自己的進程。香港人知道，吸引內地企業到大陸上市，自己是跟紐約、倫敦金融中心競爭，香港證監會報告寫的是內地企業到三個市場同步發行股票，那個市場流通量最高，最具吸引力。幫內地人理財，香港人知道如果自己提供的產品不是世界一流，紐約、倫敦的私人銀行家早就按照《富比士》名單，潛入拜訪。

當台灣眼光放在兩岸，彷彿全世界只有台灣與大陸，跳不脫、放不下。香港人卻早已用全球的角度，看大陸，看自己。因為這樣的看法，香港人有一種具備現實感的自信，沒有自憐與被施捨感，而是大聲告訴你，我在開門做生意。香港不擔心競爭，只擔心沒有競爭。

藝術家賴聲川最近出版的創意學中，對於創意的智慧有深刻的詮釋：一個人能不能累積智慧，主要是看他懂不懂「如何看」這個世界，如何看自己的「動機」、如何看自己的習性、如何看自己的生命經驗。眼睛只是感官。到底看到什麼，看多看少，是心在決定。

台灣眼中的世界是什麼？除了兩岸，網綁於自己生命經驗的台灣，是到了放開自己的心的時候。

九十五年七月十八日 A 7 香港專題民生篇

生活與內地接軌 香江變旅店

陳一冊／香港、深圳專題報導

一九六八年，作家理查休斯(Richard Hughes)「租來的土地，借來的時間」一書，貼切詮釋「租界」香港。時隔四十八年，回歸祖國已九年多，經濟與內地完全整合的香港，卻更本質地變成一個旅店。

早去晚歸 兩地通勤扮飛人

清晨的 Chek Lap Kok Airport，港龍航空公司櫃檯前已大排長龍，居住在香港的中外國際菁英，趕著由香港

飛出的第一班飛機，八點起飛往上海，八點零五分起飛往北京。最忙的時候，一個上午港龍要從香港飛出超過二十五班飛機，前往內地十九個城市。

航空公司客運部經理人觀察，香港機場往返內地的班機，不同時段搭乘者不同，早上搭飛機往內陸的，通常是香港人；中午則是清早從台北出發，在香港轉機的台灣人。深夜，則是出差結束回家，或者隔天一早有事，提早一晚飛的香港人。

根據統計，香港就業人口中超過十九萬，約六%在內地工作，當中八成是管理、專業與行政人員。大陸人，美國名校霍普斯金大學研究所畢業的古先生與經濟學博士古太太(化名)，就是統計數字的一員。住在半山，



自由行

▲開放大陸人來港自由行，的確帶來消費市場蓬勃景氣，但內地遊客不守規矩的行為，卻是最令港人頭痛的問題，在「金紫荊紀念碑」廣場，一群四川的遊客肆無忌憚地跨過欄柵拍照留念。(王蔚峰攝)

月租兩萬港幣的高級住宅(所謂高級也只有三十坪)，古先生一個禮拜待在家裡的時間，不超過兩天。有綠卡的古先生在三地繳稅，上班說的是英文，業務談的是普通話，至於廣東話壓根沒想學過。「做生意不會說普通話，是他們的損失，」古太太自信地說。

深圳熱門 通關上學成奇觀

因為經濟上緊密結合，香港機場、鐵路均可列名全世界最繁忙的關口。今年五月十三日，香港出入境管理處特別在機場管制站，裝設八條電子閘口給持香港身分證通關的人使用。鏡頭轉往陸路，九廣鐵路上的羅湖關口，超過十條電子閘口早在二〇〇四年底啓用。

與中環只有不到一小時車程的深圳，已經與香港融成一個生活圈。最明顯的例子，是今年一月起，兩地政府為了一半屬香港，一半屬深圳的羅湖居民，設了一個特殊通關口，只要秀居留證連海關都不用過了。

每天早上七點半起，小小通關口，就會出現一群群由老師前導，穿著制服，手牽著手，像小鴨鴨排著隊由內地到香港上學的幼稚園小孩。一個小時下來，人數可達三百人，這還不包含自己背書包上學的小學生與中學生。

香港當地人說，這些通勤學生多半是香港人子弟，深圳房價只要香港三分之一，花一樣的錢，住在香港鳥籠一樣的小公寓，還不如到內地去買有院子的房子。不過，因為香港教育體系還是比內地好，因此把小孩送回香港讀書。而飽受少子化威脅的香港學校，也樂得收大陸學生。

香港窮人 愛去內地買尊嚴

九廣鐵路上另外一景，則在上水。上水是羅湖前一站，因為從九龍坐到上水只要十二元港幣，但如果多搭一站到羅湖，就要三十五元港幣。因此上水成了一個批發市場，搭巴士來的內地批發商，會在上水車站把食物批給搭火車來的香港零售商。

「有一種說法，是說香港窮人是到內地買尊嚴，」一位激進香港社運團體份子說。已經行之有年，許多香港人周末會帶著一家老小，搭火車到深圳去消費一天，順便採買豬肉、青菜等等民生用品，買買衣服，上上館子。記者實際走訪比較，深圳鬧區東門的餐廳，吃一頓下來的確只要香港的二分之一；百貨公司下面的超市，食物價格大約都比香港市面便宜三成以上。

一位在香港機場工作的航空公司人員說，偶而看到內地客大包小包到香港買名牌、珠寶，想到香港人到內地去買青菜蘿蔔就有點心酸。

一個中國的香港落實到民生面，除了數字，還有更多情緒、生存、記憶與文化的層面，不能不提。

唱和北京 港人愛溜普通話

陳一姍／專題報導

「我們無心自問，香港人可以為國家做些什麼？……我們要抓住機運將經濟搞好，不要辜負國家對我們的期待，」香港特首曾蔭權七月一日酒會上說的激昂。濃濃的祖國意識，配上獨特的「搞」字，曾蔭權七一演說，充分反映出九七之後，北京官話入侵香港的現狀。

在政治與經濟利益傾斜的現實下，普通話已經成為香港的語言新貴。「港英餘孽」，特首曾蔭權特別請了家教，每日練習，進步神速。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者呂大樂說，現在特區政府說話，就像唱歌一樣。北京領導說「和諧的社會」，隔沒幾天，香港人就會聽到港府菁英口上掛著「和諧的社會」。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當胡錦濤開始講貧窮問題，特首曾蔭權也開始講貧窮問題，「北京唱主調，特區政府也學著唱，」他形容：「不過全香港人都知道，曾經擔任財政司長，相信自由市場的曾蔭權，對貧窮問題根本不感興趣。」

在庶民階級，普通話也成為大家競相練習的語言。兩年前，香港街頭還會見到梁詠琪 GIGI 代言「大家來學普通話」的廣告；但今年開始，這種廣告已經改成鼓勵大家多說英語。顯然，語言的強勢與弱勢的相對位置，已經有了改變。「現在店家聽到普通話，嘴角就會這樣揚起來，」曾目睹大陸客抱著二十多雙名牌皮鞋的長榮航空香港客運副理張青慧說到這裡，兩隻手指拉起嘴角。

在香港居住十多年的作家蔡珠兒說，早年，到市場買菜，不會說廣東話就會被欺負，使得她立志要把廣東話學好。但是香港人這五年憂患與生存意識被激發，越來越熱中學普通話。「他會不斷偵查你的腔調，一旦發現你口音不是純廣東話，立刻跟你改說普通話，想要多練習練習。」她說。

先生是上海人的蔡珠兒也發現，近來到香港的中國新貴有越來越多人，甚至是以不學廣東話為榮。尤其是越北方的人，有種中原文化的自傲，好像還覺得廣東話是「南蠻駢舌」。

不過，要說北京話將取代廣東話，也是言過其實。蔡珠兒觀察，香港這個國際都市，一直存在著一種雙語體系，之前，統治階級的英國統治者，就有許多人一句廣東話都不會講，日子照樣過得下去。廣東話也相安無事地存在者，反而還把外來文化融進語言裡，加上香港字是「我手寫我口」，香港的廣東話自成一個文化體系。譬如：香港人預約餐廳叫做「卜位」，這個卜字，就是從英文 book 來。而香港有種水果「土多啤梨」，別誤會，他不是梨，而是草莓(strawberry)。「香港文化主體性太強了，所有外來文化都會被融入，就像食物，所有食物到這裡全變成港式，」每天煮飯的蔡珠兒明確感覺。

也因為香港永遠快速吸收外來語言，蔡珠兒對於近來，香港老是講北京官話感到憂心。她認為，香港社會剛在學普通話時，政治人物就老是在說一些虛字很多，甚至語句倒裝的官話。官方用語如此，整個社會以

為這就是優美的中文，這種語言習慣遲早會影響七、八歲小朋友。

當北京官話入侵香港，後九七一代變成香港社會主流之時，香港話不知會變成什麼樣？

去年突破 1250 萬人次 內地客愛瞎拼 財富重分配

陳一珊、王爵暉／隨團採訪

連續下了三個星期的大雨，突然轉成三十三度的酷暑。炙熱中，C 旅行社的導遊分別在紅磡車站與中港城碼頭，迎接自行入境的十七名內地自由行旅客。

四年前開放自由行以來，內地到香港已經像國內旅行一樣方便，老牌績優的康泰旅行社副總經理陳建鵬說，因為交通方便，自由行旅客通常都是直接到香港才集合。去年來香港旅遊人次突破二千三百萬人次，其中內地旅客就超過半數，占了一千二五〇萬人次。

團員中，二十二歲，打扮時髦的申小姐原籍四川，高中畢業就到廣州江門工廠工作，自從自由行開放後，見同事陸續到過香港，心裡早就想來了。由於自由行必須到原戶籍地申請通行證，存夠錢的申小姐一個月前毅然辭掉工作，回鄉辦通行證，順便休假一個月，直接起程到香港。她行李少，因為只帶了一套衣服，其餘的都會在香港採買。

購物是內地客來香港的重頭戲。根據香港旅發局統計，去年，香港遊客一共在香港消費了一〇五六億港幣，占香港 GDP 七·六%，較前年成長一四%。其中大陸旅客貢獻度高達近五成，平均每人消費達四千五百五十四港幣，只比美洲旅客少九百元。以申小姐為例，這次除了團費一千二，她另外還準備了近兩千元購物預算。

由於共產主義主張無神論，旅行社都避免強調進香看相等行程。到了黃大仙廟，十七人團中也只有一半捻香，行程草草地十五分鐘就結束了。轉到廟後的商場，一行人全開買了起來。

三十歲來自廣州的梁先生說，鄰居擔心在內地買到黑心貨，知道他來香港，於是託他買萬金油、正露丸等藥品，他一口氣就花了六百港幣。根據香港媒體報導，前陣子大陸黑心奶粉吃死嬰兒時，大陸客還會買奶粉帶回家。不過，也有不少人到香港買樓。「大概有九成大陸人對香港的印象就是不斷買東西，」香港旅遊業者說。

陳建鵬說，香港自由行已經變成惡性競爭。為了拉客戶，竟然用「負團費」吸引客人，就是香港旅行社不但不收團費、還依人頭數向大陸旅行社買團。旅行社的利潤全靠帶客人到九龍木瓜灣特約商店買金子、珠寶、電器，再從消費金額中抽佣賺錢。業內估計，客人一定要花兩千港幣才能回本，這樣的演變，讓香港整體形象受傷很重，旅行社也不賺錢，唯一保證賺錢的還是旅館業者。

內地自由行旅客帶來的新活水，在惡性競爭下，越來越像是一場財富重分配。而分配到的似乎依舊是香港社會既有的贏家—擁有土地的旅館與不動產業者。而旅行業則陷入一場廝殺慘烈的生存遊戲。

各自與內地通婚 大女人小男人 分道揚鑣

張慧英／報導

去年香港有四萬對新人結婚，近半數是迎娶內地姑娘。相對地，香港女性生育率已經降到世界最低的0.9五，不婚熟女數目持續增加，香港男和香港女，似乎正分道揚鑣。

前全產總秘書長、正在香港科技大學攻讀博士班的林宗弘觀察，香港女性很強勢，構成了真正的中堅階層，「男人很沒用，像小男孩，不負責任、幼稚、逃避」。因為現在大學男生比率低到只有三五%，會考還得設保障名額。

此外，受到近年來產業轉型的衝擊，藍領製造業崩潰，女性比較多的金融服務業影響較少，結果社會階層分流，很多男性收入與社會地位低於女性，因此到內地娶老婆的愈來愈多。

作家蔡珠兒也指出，港男娶大陸妹的，絕大多數是中下階層。相反的，近年來有愈來愈多中產港女和大陸哥通婚(但都是階級相當的男性)。

至於獨身熟女多，是因為適婚女性數日本來就高於男性，加上階級差異，情況更嚴重。這裡的階級有兩個意義：

中下階層男性因九七後產業轉型而更邊緣(人數也更多)，離中產愈來愈遠，通婚更難。

在通俗論述中，港男認為港女太「叻」(能幹)、太「高竇」(眼睛長頭上)，高攀不起。八卦雜誌和港劇、電影，都反映出這種焦慮。香港女性又的確是比較俐落能幹，在學術和產業方面日漸佔領優勢。於是就像貧富嚴重分化，港式「叻女」和小男人的鴻溝也日漸加深。

相較於台灣的女性論述，蔡珠兒認為，香港人務實，極少人談女性主義(尤其知識份子)，但制度上卻容許女性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公務員中有不少女性成為高官，商業界亦然，所以是有實無名的女性主義。

人口老化 新香港之子激增

鄭漢良／報導

和其他發達城市一樣，香港人忙著賺錢而沒有時間結婚生子，但為什麼香港醫院卻擠滿了等待分娩的孕婦呢？因為她們都是來自大陸內地的產婦，有些更是生了之後席捲小孩一起溜之大吉，帳單由香港納稅人買

單。這些在技術上因為生在香港而成爲新香港之子的小孩，累積下來實在不少，並勢必影響整個香港未來人口的結構。

根據香港保安局的統計，在香港公立醫院分娩的內地婦女人數，由二〇〇三年至〇四年度的八千七百多人，增至〇四至〇五年度的一萬二千三百人，即醫院每三個產婦便有一人是大陸內地人。不只如此，約有一半的產婦和丈夫都不是香港人，這些小孩日後都可以申請成爲香港人。

有些大陸商人看準這個賺錢機會，開辦到港生小孩的地下服務，每名產婦收費二萬元人民幣，便可以享受到一條龍服務，到香港租用的單位待產。深圳有些旅行社的廣告是：給寶寶一生最珍貴的禮物，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而且還可以享受九年免費教育。

跨境生小孩只是香港回歸以來人口結構變化的其中一個因素。越來越多香港男女北上擇偶、越來越多老年人索性搬回大陸鄉下安渡晚年，也是這幾年來相當普遍的現象，這種變化更是概括了所有年齡階層。

根據統計，兩地通婚過去年齡最多有相差四十歲，但近年到香港團聚的夫婦，年齡差距少有超過十歲，原因是年過半百到大陸成婚者減少。此外大陸隨著經濟起飛及文化開放，適婚人士在地區流動大了，接觸的人也相應增加，以往與港人成婚的優越感漸漸淡化，許多婚姻於是建立於感情交往。

港男北上尋偶其實與香港本身的客觀因素有關。根據香港統計，最適合結婚的女子年齡應該是二十六歲到三十歲。但調查卻發現適婚女子很多都以事業爲重，與當年只想嫁一個好老公的概念相去甚遠，導致港男難以找到對象，而且不少港男還爲了經濟及教育水平自愧不如香港女子轉而尋覓大陸女孩。

但香港出生率低和人口老化，畢竟是一個隱憂，針對鄰近大陸人口透過多方渠道輸出，特區政府一直試圖予以規範，例如香港入境處上月底公布了輸入優才及高技術人才計劃的計分制度，企圖吸引優秀人才，提高港人的平均質素及刺激香港經濟。

台灣不要重蹈覆轍

陳一姍／報導

九七年，一位香港人對採訪的台灣記者說，香港將是全世界最值得台灣仔細研究的地方。不僅該研究香港的根與莖，就連葉子都應該翻面細細研究，因爲香港將是台灣的縮影。

旅店的香港、內地客的香港、京片子四處可聞的香港，將比政治，更早、更快、更全面地，影響整個台灣。當台灣商人、白領菁英無可逆轉以大陸爲主戰場，什麼是家？家的定義，有什麼改變？除了省籍，台灣應該做的是，創造一種價值認同，讓這群遊子自然又舒服地說，台灣是我的家，我讓孩子在這裡受教育，在這裡長大。

當大陸人士來台觀光，終於成真。台灣是否已準備好，能夠不重蹈香港覆轍，提供願意讓人付錢的旅遊品質？台灣是否能有自信，不光靠新鮮感、低價拚搏，還能吸引大陸財神？因為唯有價值，才能真正讓旅遊業受惠，創造出的就業才真實。否則像香港一樣，自由行並未讓清潔、餐飲等中低階勞工的薪水提高，甚至旅行業也苦哈哈，最後造福的依舊是資本家，一群有地的旅館業者。

當北京官話入侵香港，台灣能不能在兩岸三地，展示一種更豐厚而文明的文化實質？能夠擺脫政治與經濟規模上，絕不可能獲勝的現實利害，取得精神上的參與與主導實力？台灣自豪的民主與多元文明，能否反過來影響兩岸三地？還是會像香港一般，只能屈從於經濟現實。

民主 正等待從鳥籠裡飛出

張慧英／專題報導



選民服務…招待旅遊

▲在台灣可能觸犯刑罰的抵澳旅遊招待，對香港的區議員而言卻是司空見慣服務選民中的一項。在深圳車站的候客處，一群導遊就大刺刺的高舉「xxx議員辦事處主辦 深圳三天團」的招牌集結選區遊客。（王蔚攝攝）

在街頭，幾位民主黨派議員正揮汗募捐，希望民眾踴躍捐款支持。

一位保險經紀人看到這一幕，不覺得感動，反而心想：「你們是大律師耶！賺的錢比我多了不知道多少，還要我捐錢出來給你，有沒有搞錯？」

這正是民主黨派普遍面臨的一個困境——太菁英了。

流傳在立法院議員助理中的一則笑話是，某位知名的民主黨派議員有天難得搭了公車，回來抱怨說：「公車裡面的走道怎麼那麼窄啊，而且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為什麼不直直走、偏要繞來繞去？」

被一個最古老民主國家統治一百五十年、又與國際密切接軌的香港，對民主內涵的了解，卻落後得讓人跌掉下巴，而這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困境。長期貧瘠於人文素養、公民參與及民主意識，又面對獨裁體制的中國，先天不足的香港，在更嚴峻的新環境裡，開始回應出新的民主幼苗；逐漸覺醒的社會力量，也正學習尋找及發出新時代的聲音。

經濟仰賴內地 無意與中翻臉

香港的民主運動面臨許多困境，第一個就是中共。和大陸內地比，中共給香港的空間已經算大。但還「無法接受在自己管治範圍中的政權來源不是他」，港大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陳祖為說。「他們從不承認香港的體制出現問題，也不正面解決，而是盡量找好的人出來，把經濟搞上去。」

經濟這招確有神效，隨著中國迅速成長，香港在經濟上已經愈來愈依賴大陸，太多人的飯碗要靠中國，想到將來的無限商機，建立人脈拉攏關係尚且不暇，香港人實在看不出和北京翻臉的必要。

特首不能普選 體制處處設限

第二個困境在制度。特首不能普選，六十席的立法會議員只有一半民選，另一半是職業團體選出的功能界別議員，加上親中的民建聯及親商的自由黨議員，組成了所向披靡的表決部隊。外號「長毛」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說，這兩種民意基礎懸殊的議員要坐在一起開會，「太醜陋了！」

在處處設限的體制設計下，選得再好也是白搭。儘管九七以來民主運動聲勢漸強，泛民主派的得票率已超過六成，但是，「我們的選民再多，表決時還是少數。」公民黨黨魁余若薇氣憤地說。

其他的民主配套更是少得可憐。連政黨法都沒有，政黨不得不以公司名義登記，集會遊行的規範也在九七後轉趨嚴格。而特首不能參與政黨，更是舉世罕見。公民黨主席關信基指出：「這意味著永遠不會有執政黨，對有志從政的人，政黨就變成了包袱。」

民眾講求現實 普遍政治冷感

第三個困境是民眾支持不足。許多人是為了逃避政治禍害才來香港，對政黨或政治觀感都差，不希望砸了這個避風港，因此反對強硬手段，更不想和北京翻臉。雖然幾次遊行聲勢驚人，甚至阻止廿三條立法並換掉董建華，但陳祖為指出，香港人原則上支持民主，心裡卻把民主排在政府效率與經濟發展之後。港人「既沒有經歷過全面民主的好處，也沒有經歷過威權的壞處」，對民主的堅持度不高。

這使得民主黨派進退維谷，文攻嘛拚不過票數，武鬥又會犯眾怒。穿西裝打領帶地關在鳥籠裡，除了叫兩聲，什麼事也做不了。廿五歲的議員助理陳偉雄就認為：「要爭取民主，不能靠現在這些議員，激烈的都不敢做，我認為沒有不流血的民主，也沒有不犧牲的民主。」但極端現實的香港人，恐怕二者都不願做。

乏魅力型領袖 民主派鬧內訌

第四個困境是缺乏魅力型領袖。民主黨派都是傑出菁英，只是缺乏草根型魅力領袖，不擅群眾動員及組織經營，論述能力差。《明報》政論專欄作家洪清田說，「你看沈富雄講得多深刻，陳水扁電視直播兩個小時不必看稿，香港沒有一個人排得進台灣前五十名。」

第五個困境是民主派本身的問題。最近以來，由於民主黨派內部多次傳出內訌，對整體形象大有影響。當民主派有意推人參選下屆特首時，屆時能不能團結一致推出共同人選，還有待考驗。

此外，民主派和時代的最新脈動漸形脫節。在金融風暴、產業轉型震盪下，從專業白領到失業藍領，都需要有人代為維護及爭取權益。但民主派先把民主和反中連結起來，以致於失去為香港代言的位置；復未能掌握社會最新的脈動，自己沿用舊觀念面對新中國，這已不能滿足港人的要求。

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馬家輝分析說，香港社會出現了一些新的脈動，而民主派尚未精準掌握。例如：幾次七一遊行，讓年輕人覺得遊行發聲、活躍參與是有用的，於是出現很多三十歲以下、擅長網路串連的社運團體（「圓桌」、「三十會」），他稱之為「七一的小孩」。其次是九七後南移的大陸人很多，他們是菁英不是難民，而且挾著中國的資源人脈前來。第三是中港關係改變，以前井水不犯河水，還在是河水灌溉井水，整個情勢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水平監督完整 仍具民主條件

難道香港民主無望？當然不是！陳祖為強調，香港守法、清廉、司法獨立、效率好、教育水準高、公共建設良好，絕對可以實現很好的民主政治。而且香港人理性、務實、願意妥協討論，這些更是民主良性運作的必要素質。

此外，陳祖為指出，民主的責任監督(accountability)分成垂直與平面兩種。垂直是由人民選出民代與首長，平面則包括行政監督、司法、廉政機構等，香港雖然沒有垂直的普選民主，但水平的責任監督卻很完整成功。或者可說香港是以比較有創意的角度發展體制，不能光拿兩個選舉來評價。

香港絕對有條件、也有機會追求民主，只是整個社會還在尋找自己的聲音，等待新的力量成形。而目前最強的驅動力，一是遊行，二是普選。

從八九年六四的百萬人上街頭開始，遊行成了最直接也最重要的民意管道。不搞抗爭衝撞，單純以願意走上街頭的驚人人數，對當局形成無可迴避的政治壓力。

透過遊行發聲 構建政治力量

○三年七一的五十萬人遊行，迫使政府擱置廿三條立法；○四年七一的五十萬人上街倒董要普選，終使北京提前換下董建華。這些年來，港人愈來愈習慣用遊行吶喊出心聲，在鳥籠體制外自行構建政治力量，這本

本身就是一種全面深化的民主啓蒙，逐漸洗滌掉長久以來對這片土地的疏離與無力。

民主黨主席李永達指出：「問香港人要不要民主？要！可以為民主付出什麼？遊行、捐錢，再進一步就沒想到了。但香



港人也有很可愛的地方，每當民主運動在很緊張、很重要的時刻，大家就會站出來，香港的居民沒有令我失望過。」

現在所有民氣都集結於「雙普選」，老老少少，每個人都告訴你要普選，至少也要給個時間表，普選因此成了北京背上一根拔不掉的刺。固然民主內涵不只普選而已，但它最簡單易懂，又明載於基本法，像掛在前方的紅蘿蔔，拉著香港民眾一步步往前走。

至於會以什麼步伐、什麼方式、最終走到什麼地方，都必須與中國的政治發展連動。長遠看來，香港必然走向民主化，一如中國必然走向民主化。而理性務實、不衝動莽撞的香港人，未嘗不能在台灣之外，以自己的方式創造另一種民主化模式。

港政治人物眼中... 台灣法治薄弱 但民主已確立

張慧英／專題報導

台灣的民主一路跌跌撞撞，近來的弊案更讓人在國際間抬不起頭。這種帶著污點的民主，以及割裂血緣的台獨傾向，普遍帶給香港民眾負面印象，但堅持民主價值的人仍然覺得，比起來，台灣的民主畢竟還是走在令港人欽羨的前方。

反改革派 以台為負面教材



依我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
（王蔚攝）

▲香港特別行政區公民黨黨魁、立法會議員余若薇。
（王蔚攝）

香港人理性守法，台灣的國會打架、抗爭乃至弊案，都讓港人不以為然。所以反改革派經常警告，民主搞得不好就會像台灣。立法院議員、公民黨黨魁余若薇表示，民主派常被質疑「台灣不是一人一票嗎？怎麼亂成那樣？所以我們還是應該平穩。」這對反對運動造成了一些干擾。

但民主黨主席李永達並未降低對台灣民主的評價，他常反問說：「北京太子黨有沒有貪污？有沒有任何兒子、女婿被抓起來？台灣同胞不能允許的作法，在內地卻只是小事。」他指出，趙建銘的例子當然不是好事，但至少反映出台灣的傳媒、國會及司法機構發揮了監督政府的

作用，「顯示台灣的民主成熟了，台灣的民眾也成熟了，不可能走回頭路。以後不管誰做總統，一定要是個清廉的總統。」

而且，李永達很欽佩台灣民眾為民主的堅持與付出：「台灣的民主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台灣同胞付出了代價、時間，二二八、美麗島事件，很多人都坐牢了，這才以自己力量慢慢爭取到民主。」

藍綠對立 社會分裂太嚴重

人大代表李鵬飛則認為，阿扁女婿的問題，「是他家裡的問題，並不是民主帶來的問題，台灣在法治上比較薄弱，但台灣的民主已經確立，一人一票的選舉是沒辦法改的。」

也有人看到了比較深層的問題，港大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陳祖為指出，台灣例子的教訓，不是中國文化不適合發展民主，而是無論什麼制度都要有法治及監督機制。然而，比較令人擔憂的是，「台灣變得只有藍綠不問黑白，黨派滲透到社會的各層面，社會分裂對立得太厲害了。」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指出，過去台灣民間的反抗運動已有一定的力量，但民進黨取得政權後佔據了民間的平台，把群眾運動吸納到黨的外圍，以致於不再有過去的黨外力量。無論未來台灣選擇走那條路，總的來說，都必須回應全球化、回應冷戰後的新局勢，即使走向獨立，也必須決定要在全球化的東亞扮演什麼角色，不是說獨就獨那麼簡單的。

愈搞台獨 中國民主就愈慢

香港人幾乎都討厭台獨，民主化逐漸將台灣帶往獨立之路，港人因此無法完全肯定台灣民主的價值。港大建築系副教授王維仁說：「再怎麼主張民主和基本人權的，一碰到台獨議題，非常法西斯的民族大義就出來了。有些是因為民族情感，但更多的是在表態，近年來輿論口徑愈來愈一面倒，因為中共的最大禁忌就是民族。」

在董建華特首任內負責對台關係的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透露，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倫敦表示願考慮到大陸發展組織時，由於他是黨員直選出來的黨主席，這對中共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各地幹部沒一個敢回應。如果台灣民主產生的總統接受「一個中國」方向，並與中國談判，大陸民眾看到直選的台灣總統也變成中國體制的一部分，要求選舉的壓力將會非常巨大。但「台灣愈搞台獨，中國的民主就愈慢。」

公民黨主席關信基：缺少血淚經驗 不想為民主付出

張慧英／專訪

三年前成立的公民黨，是香港新崛起的民主力量。黨主席關信基指出，從事民主運動最大的挑戰是改變市

民的政治文化，因此除了繼續推動普選之外，未來還應該透過公共議題的討論，增進民眾的參與及主體意識。以下是專訪內容：

問：在香港推動民主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答：改變市民的政治文化。港人對民主內涵的理解，是把自由等同於民主，想做什麼政府不要干預就叫自由，政府肯諮詢我就算民主了，理解民主必要內涵的不到一五%，對香港人來說，自由是最重要的價值，如果政府能提供他就可以滿足。

當然，這不表示他不懂特首、立法會應普選，但對於選舉作為一個實現民主的工具的了解與承擔，是很脆弱的，一般人不太願意冒風險，不願影響經濟成長與社會和諧，要鬥要爭時就當旁觀者了。

這中間有個矛盾的地方。人的心理是愈缺乏的愈想得到，人民如果生活在白色恐怖威權下，會特別有翻身的渴望，想參與、改變命運。可是英國的殖民不是壞到那裡去，香港人沒那麼多血淚，所以不會為民主付出很多，民主觀念的推廣於是比較困難。

問：那你會有孤軍奮戰的感覺嗎？

答：你在日常生活遇到自私的人，是不是自己也要因此變得自私、罵他、打他、不幫他？一個社會會產生這種人，是源自本身歷史與社會關係，不能怪任何個人，這是制度發展的依賴造成的。為了這個地方的發展，總要有人站出來打破依賴的路徑，開創出一條新的路。沒這種人出來，社會就一直這樣下去，這不應該的。香港人比較自私短視，不能怪他們，從鴉片戰爭以來就在夾縫中求生存，自己沒有主體地位，在這裡只是過客，所以比較注重自己的生存利益。但已經逐漸改變了，因為本土出生的人愈來愈多，在這裡成長、受教育，自然比較會有歸屬感，有意願把這裡搞好。

問：如何讓民眾了解民主的內涵並願意參與？

答：公共議題可以是一個管道。像添馬艦計畫，我們表決一定輸，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多時間精力提論據、做模型、辦說明會、設計公民參與活動？除了表示一種專業的態度，也是把背後不同的價值觀鋪陳出來，是要經濟發展還是文化永續？這是為了促使市民思考，一項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是不是可以有另外的想法、另外的價值？我們希望讓市民關心這件事，關心後要了解，了解後要參與，因此獲得主體地位，不再只是旁觀者了。

政治無間道 是港人還是中國人

張慧英／報導

香港公屋租金最近要漲，氣壞了很多低收入的人。不久前，在一場說明會上，有位老婆婆氣得大罵：「曾

蔭權在搞什麼？是不是在演『無間道』？」

「無間道」裡，劉德華是黑社會臥底到警方的人，梁朝偉是警方臥底到黑社會的人。在真我與假我之間穿梭久了，兩人都愈來愈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最後，劉德華說：「我只想當個好人。」梁朝偉說：「我只要回自己身分。」

這完全呼應了回歸後香港人的困惑與掙扎，到底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那個是真我、那個是假我？因此民眾常用「無間道」來形容政治，最明顯的例子是曾蔭權。

他是替前朝服務的「港英餘孽」，忠誠度不無可疑。如今搖身一變成爲行政長官，到底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這個疑惑，其實曾蔭權不需要、也無法提供解答，因爲它是香港人對自己定位的焦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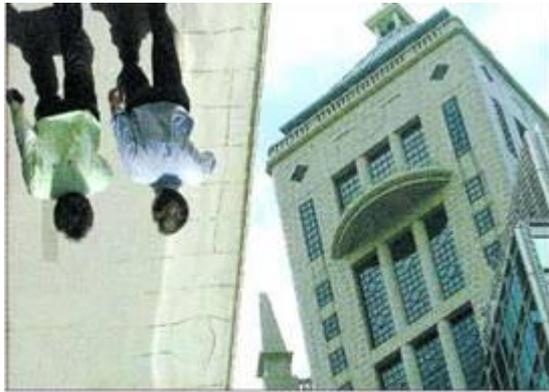
曾蔭權是不是個臥底的？也許他和劉德華一樣：「我只想當個好人。」

至於只想做回自己的那個梁朝偉，最後在電影裡掛了。

九十五年七月二十日 A 6 香港專題社會篇

人人想賭一把 資本叢林裡的生存高手

張慧英／專題報導



寸土寸金

▲對一般寫字樓的上班族而言，買樓幾乎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王蔚攝）

在鐵達尼號的救生艇上，那些坐視落海者掙扎呼救而不曾伸出援手的人，心裡在想什麼呢？也許已經被恐懼癱瘓到只剩下自保的本能了吧。

外界印象中的香港，是自由經濟的成功典範。但很多人可能無法想像，在耀眼光彩之下，香港也是一個嚴酷的資本主義叢林。它實施的是「自十九世紀以來就沒修正過的資本主義」，《明報》政論專欄作家洪清田形容。大部分國家對資本主義的修正，幾乎都沒有在香港發生。

繁榮 建築在不公正之上

所以，沒有反托拉斯法，長期由大財團壟斷市場炒高地價，也沒有最低工資，勞工缺乏保障。貧富差距極大，而且持續惡化。平均薪資比台灣還低，國民所得卻是台灣的一·七倍，這表示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中下階層生活非常艱苦。

「香港的繁榮是建築在強大的社會不公正上，外面只看到繁榮，沒人談社會的不公正，」最近把關注重心移到香港的作家龍應台說，「我們以為香港有廉政公署，不會有貪污，但他政商勾結是合法訂在遊戲規則裡的。外面的人不是認識香港，而是認識『中環價值』，整個香港的運作也是以『中環價值』為核心。但符合『中環價值』的只是少數，少數人卻壟斷大多數人的需要。」

這樣一個不能符合現代公義標準的結構，為什麼一直不作改革？為什麼社會底層的人只能自生自滅？

中環價值掛帥 貧富懸殊

要在不確定的環境中控制人生，會更強調個人作為，更渴望抓住具體的東西。而資本主義相信自由競爭的絕對價值，覺得靠自己努力和適時的運氣，每個人都有機會，因此誰也不欠誰，各自為際遇負責。於是，這個社會裡，每個個體都是孤獨的，和其他人沒有什麼連帶感。大部分人極端務實，對生存以外的事都沒興趣，一切以自利為考量。金錢幾乎是唯一的價值，也是衡量一個人成就的標準。有理想、為他人付出，都不是被肯定的價值。

因此，嚴重的貧富差距和制度上的不公義，一直可以被視若無睹。百年來不會是這片土地的主人，香港人普遍有一種無力感，覺得不公平也沒辦法。加上政府有公屋、綜合援助、醫療福利，最底層的人也勉強過得去。一半的人不必繳稅，要繳也只繳一六·五%，不像台灣人一想到血汗錢拿去養那種政府就怒從中來，所以社會並沒有強大的改革動力。

在這個弱肉強食的資本叢林裡，每個人都是精明現實的生存高手。而生存的本能如此巨大絕對，沒有為夢想、關懷、付出留下多少空隙。「香港跟賭場沒什麼分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披著標誌的長髮，慢條斯理地說。「賭的人覺得，不公平沒關係，能贏錢就行了，除非賭贏了他不給錢。」

但是，太多的自利，累積成整個社會的疏冷，不幫助人、也知道不會有人幫助自己，就很難凝聚出維護整體利益的力量，無法改革制度性的缺失，最終反而傷害了個體的利益。在資本叢林裡討生活的生存者，或許也是自己的受害者。

短視近利 扭曲產業結構

只顧著賺錢，對香港還造成了另一項隱憂—社會成長的狹窄扭曲。曾任上海出版局副局長的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趙斌指出，因為想賺錢，太多學生選擇念商科，不要說文科、連理工都不受青睞。「這種價值觀的不平衡，會形成一個瓶頸，最終使得產業結構難以突破。」再往前看廿年，屆時培養的人才都偏商科，沒有高科技，金融人才太多，整個產業結構都會面臨問題。

上次的金融風暴就清楚顯示，香港過於依賴金融市場和房市，任其他產業萎縮，也未開拓新產業。但即使跌過那一跤，香港還是沒有一個產業政策，想發展高科技卻失敗，沒有培養人才，不重視教育學術，「這個政府只想賺錢，人文語彙從不出現。」龍應台說。

因此，香港缺乏應付產業轉型的基底。政府及菁英階層只想如何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只有少數菁英能參與這種資源分配，中低層勞工失業、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都無法解決。這不是因為九七、也不是因為經濟過度依賴中國，而是長期以來一切向錢看的短視近利，讓整個社會扭曲而脆弱，失去很多讓自己強壯的養分。

也許，要把那顆還在救生艇上驚惶失措的心帶上岸，在穩定的土地上慢慢解凍，重新建立個體與群體的關係後，香港人才能逐漸找到走出叢林的道路。

與海爭地 有土斯有財 高房價市場 政商共生共榮

陳一冊／專題報導



自生自滅？

▲貧富懸殊是香港生活的寫照，在灣仔熙來攘往的人潮中，乞丐就這麼大剌剌蹲坐在天橋間，等待路過華服革履的上班族，施捨些許的同情。

(王蔚璋攝)

椅子！
椅子！
椅子！
不說
不注意，
在香港
人來人
往、
明亮
現代的
公用
空間裡，
椅子
真的
是稀

有財。

地鐵站裡，牆壁旁兩個人寬，二十五公分深的無把手鐵椅，功能只容許人把屁股掛上。中環置地廣場，除了中間噴水池邊可以讓人坐坐，其餘除非花錢，否則連個擱腳的地方都沒有。在人口密度最高的中環，不見行道樹，不見小公園。香港人到台灣必逛的誠品書店，在高房租的香港根本不可能生存。

一切一切，「因為這裡是地產社會，是用地產開發商的角度來思考所有的事情，」已到香港三年的光華新聞中心主任路平詮釋。

像個被綁架的地產社會

土地，對香港而言從來就是奢侈。與海爭地已經一百多年的香港，就像是個被綁架的地產社會。地產商、政府共存共榮，維持著高房價；靠著拍賣高價土地，香港政府可以維持低稅率，卻有台北市政府八倍預算的足夠稅收可以支用，讓一半的香港人不必繳稅，但這些不繳稅的人，也註定一輩子買不起房屋；所幸，香港政府還提供公屋可住。「香港的制度讓人覺得一輩子買不起房子，也無所謂了，」城市大學傳播系教

授李金銓說。

而香港房地產與股市結構連動，也讓中產階級陷入角色矛盾。李金銓說，本來中產階級對於高房價會覺得不合理，但賺了錢的中產階級一旦買了房子，就不希望房價下跌；還買不起房子的人，積累了些錢，下海去買地產股，也不希望地產股跌。

除了人性使然，也由於地產是香港政府財政主要來源，前全產總秘書長、正在香港科技大學攻讀博士班的林宗弘觀察，地產商與政府其實是一個共生體。「香港就是A O與地產集團的結合體，」他說，A O是香港行政官僚的俗稱。這樣的共生，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香港遲遲沒有「反托拉斯」法。

沒有縫隙壓力矛盾處處

事實上，早在一九九六年香港消費者委會就發表調查報告指出，香港雖然沒有法律障礙，阻止任何人加入樓市，但新進入者與原有大地產商競爭時，卻面臨有限土地供應，高昂地價的不利因素。在買賣預售屋時，也會利用販售技巧，刻意拉高房價。一九九六年時，十大發展商就已掌握七成住宅，顯然是不公平競爭。如今距離報告提出已經十年，新法規依舊只聞樓梯響。

平路觀察，香港身陷在地產社會的思維裡，陷入一種必須靠地產增值，否則社會沒有辦法往前推進的狀態。也因為這種地產社會的特質，讓香港成爲一個沒有縫隙的社會。

沒有縫隙，讓香港茶餐廳清早六點開門，必須營業到凌晨三點才能付得起店租；沒有縫隙，讓香港再好吃的大排檔(路邊攤)，也無法翻身變成店面，因爲不足以支撐高地租。改編一下巴士阿叔的話，這真是一個壓力處處、矛盾「未解決」的社會。

後九七時代 從天際線蛻變 看權力移轉

陳一珊／專題報導

後九七時代，香港最具象徵意義的「添馬艦政府總部」興建計畫，六月二十八日在香港立法局表決通過了。

這塊維多利亞港邊唯一的空地，這塊因爲奢侈的閒置，曾經有五千人開心泡茶、一萬市民圍坐吃盆菜的空地，將高高建起特區政府總部。一八六三年英國海軍添馬艦曾在此停留，二次大戰時擔心被日軍使用因此炸沉的故事，就此埋葬。

再過三年，添馬艦只是天際線下另一棟高樓；再過十年，也許更短，香港人不會再記得皇后大道曾是港英政府的政治中心，「添馬艦是一種新的權力建構，代表真正的改朝換代了，」香港大學建築系副教授王維仁說。

與天爭高是人類的獸性，改變中的香港天際線，也正是香港歷史的縮影。客居香港十多年的王維仁觀察，香港的天際線，是隨著統治者先來後到的順序產生的。香港最早發展、最精華的中環，迄今仍大多是英資集團集團所有，如置地廣場、渣打、匯豐銀行大樓；老一輩港資財團的大樓，多半散佈在金鐘、灣仔一帶；而一九九〇年代才來的中國內地財團，則更往西，以上環、西環為中心。

地址為干諾道西一六〇號的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大樓，就是新政權改造天際線的一個代表。

上環與西環之於香港，就很像迪化街、西門町之於台北，是屬於比較老的區，香港第一條街—荷里活街就在上環。中聯辦大樓一九九七年後不久低調落成，由於大樓下掛的是招商局公司的招牌，不知道的人即使路過，也渾然不覺。不過，如果從半山腰看，樓頂上有顆一如上海浦東東方明珠電視塔圓球的中聯辦，是上環能見度最高的大樓。據說，那顆球就是中聯辦的幹部俱樂部。「一到香港就建大樓，目的是要解構港英的空間，」王維仁解讀。

政治力之外，內地商業資本更是改造天際線的主力。中國銀行與匯豐兩棟大樓的故事，早已是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匯豐銀行的建築，延續巴黎龐畢度美術館管線外露的機能性風格，高跨距建築形式，號稱可以拆、搬到異地重組(匯豐銀行表示，這只是建築概念，不可能拆掉重組)，每單位造價是全球最高。

看見匯豐銀行創了這麼多世界記錄，五百公尺遠的中國銀行，當然不甘示弱。王維仁說，在預算較少的情況下，貝聿銘設計重點就是要高。因此四周全部是玻璃帷幕的中銀大樓，蓋得就像一把直聳入雲的劍，甚至屋頂還裝上兩根避雷針進一步墊高高度。「這是競爭意識的一種展現，」王維仁解讀。有趣的是，香港經濟差的過去幾年，迷信風水的港人常抱怨，就是中銀兩把劍勒住香港的咽喉。

不論喜歡與否，商業夾帶政治的威力，已重新塑造城市。港英第一條大馬路皇后大道註定離中心越來越遠，而未來的風貌「李嘉誠的地產就可以從一號買到十號了！」綽號「長毛」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說。

公屋像鴉片 讓人又愛又恨

陳一姍／報導

不分寒暑，陳偉雄的一天早就開始了。家住新界大埔墟，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現在是公民黨議員吳靄儀助理的陳偉雄，每天六點多就得搭上家門口的巴士，才能在九點前趕到中環的立法會辦公室上班。

「最幸運的是，不用換車，車上還能睡上一覺，」二十五歲的他滿足地說。

在香港，陳偉雄一家六口的生活，是七十一萬公屋居民的縮影。香港最重要總督麥理浩提出三大穩定社會措施：公共房屋、公共醫療與廉政公署。香港人的住宅因此被拆為三塊，買不起房子，個人月收入八千八

百港幣以下的租公屋；經濟稍微好一點的買居屋，價格是市價六成；經濟情況更好的就買私人住宅。去年，公屋、居屋與私屋戶數比例約為三成：一成五：五成五。

以小學就搬進大埔墟公屋的陳偉雄為例，父母都是工人階級，家裡還有三個兄弟姐妹，一平均下來就符合住公屋的標準。因為有六口人，陳家分到最大的單位，所謂最大也只有二十坪。

陳偉雄帶著我們走過幾十戶長廊，拉開拒馬般的鐵門，一尊土地公收斂地蹲在牆角，「公共空間不能堆放物品，所以只能擺小的，」他解釋。

走進二十坪小房子，可以明顯感受到陳家的用心，因為小小的房子隔了三間窄小的臥房，父母、二兒、二女各一間，再斜斜隔出一廚一衛。客廳窗框上架著晒衣架，以彌補沒有陽台的遺憾。不過，把陳偉雄與弟弟養大的房間，擺了張上下舖與書桌，就完全放不下櫃子了，書架只得利用床頭的空間。在妹妹的臥房裡，一七五公分高的陳偉雄一張開雙臂，再三十公分手指頭就能碰到兩邊的牆壁。客廳略見斑駁的灰泥牆，以台灣人的標準，實在稱不上讓人連聲喊幸運的住宅。

「不過，我們真的是很幸運的了，」陳偉雄重複強調地說。因為前幾年，他們正好搭上公屋政策修正的列車，政府特准在公屋居住超過十年的居民，能夠以超優惠價買下房子。陳家原本一個月房租要二千元港幣，因為這個優惠，他們湊足了二十多萬，買下現在住的房子，房價只有不到市價十分之一。另一個幸運，則是跟隔壁鄰居擠到幾乎走不動的一人房相比，陳家實在還蠻寬敞的。

之前擔任區議員助理的陳偉雄說，公屋是選民服務的常項。常有老人希望自己的兒女分到附近的公屋，但根據規定，新申請者必須從很遠的天水圍開始住起，無法幫忙。「公屋分配由一個小組負責，小組的人很神秘，從不跟外面接觸，也不接受關說，所以公屋的分配非常公平，」他說，因為公平，香港人很少抱怨公屋分配。

公正的公屋分配，使得香港人像是吃了忘記高房價的鴉片。之前也住公屋、綽號「長毛」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分析，相較於台灣有無殼蝸牛運動，香港因為有公屋，面對不合理的高房價，感受就沒那麼深。而香港社會有一個奇怪的特性，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久了，就變成個人問題。

公屋現象只是香港特殊社會的一個顯影，是好是壞，會不會成為削弱改革的動力，答案還沒有揭曉。

九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A 8 香港專題文化篇

彈性愛國 沒有敵人的港式情懷

鄭漢良／專題報導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去年到香港中文大學領取榮譽博士時發表演說，當中引用英國科學哲學家 Karl Popper 的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指出，社會的敵人就是歷史主義，即由柏拉圖到黑格爾一貫下來的各種歷史決定主義，而只要認清了開放社會的敵人，不讓敵人存在，自然就是個開放的社會。



民主力量

▲新聞自由是維持香港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即便香港人普遍對政治冷感，但透過國際，特別是台灣的政治新聞，民主的浪潮也逐漸在香港發酵。（王爵暉攝）

在香港這個開放的社會，可以說本來就沒有敵人，沒有與生俱來意識形態的敵人。在中國大陸，人從小就受到敵我教育的灌輸，美帝、腐敗的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蔣幫、甚至連同胞及家庭間也有階級的敵人。在台灣，提防匪諜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和責任。

開放社會 意識形態薄弱

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的殖民教育非常成功，因為它幾乎完全沒有殖民色彩。香港人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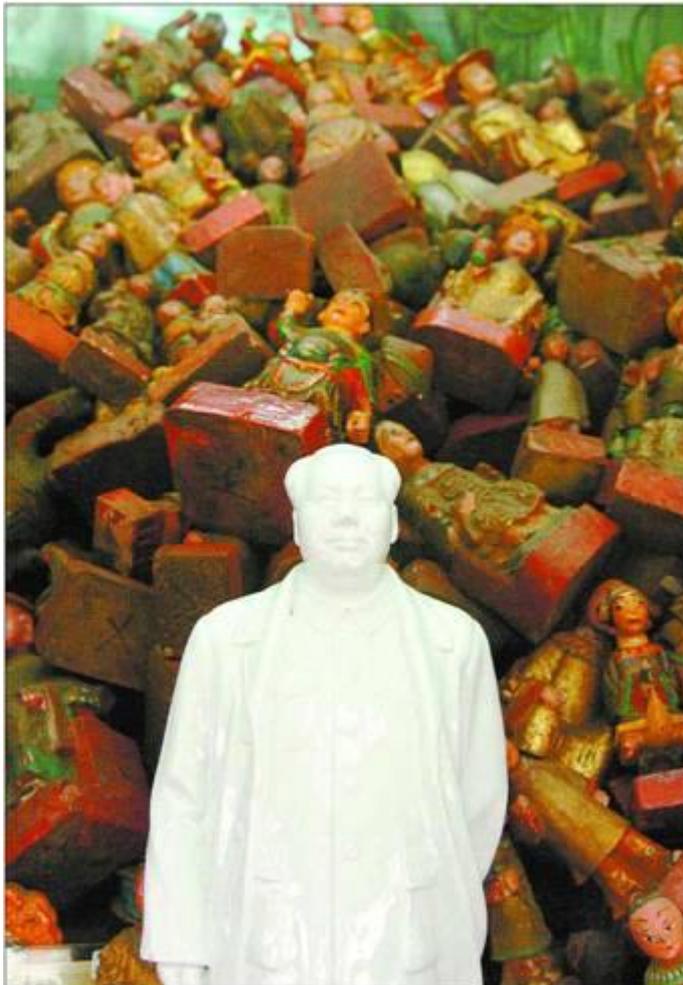
從小就要提防的匪和幫，書本上也沒有硬銷戰無不勝的英女皇。在過去，電視台收播或電影院晚場散場時，還附帶一齣英女皇騎馬檢閱御林軍的紀錄片，後來因為流於形式化，政府索性取消。這與台灣八十年代末還要為電影放映前要不要播國歌吵個不休相比，不能不讓人佩服英國殖民統治的手段。就算在公家學校，

也不用每天早上向米字旗敬禮，更不必高呼「天佑吾皇」。

香港人從來不喊口號，只做不說。其實香港人根本沒有口號可喊。香港沒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建國必成、反共必勝」。同樣的，就算在大陸鬧文革最凶香港鬧暴動最烈的時候，放炸彈喊口號的，也都是
一小撮左派分子。

香港浸會大學傳播學院前院長朱立說，在港英年代，香港的輿論可以左批國民黨右罵共產黨，有些報紙甚至還敢嘲諷英國王室。一九六一年英國雅麗珊郡主坐遊艇訪問香港，進入維多利亞港時港英政府鳴炮歡迎。翌日香港《成報》頭條標題是「御妹過海，禮炮十三響」，總編輯韓中旋被港府「了解」一番之後，毫髮
無損繼續做其總編輯。（用廣東話「過海」語音似女性某部位。）

在過去，香港人唯一的敵人，恐怕就是一個「窮」字，這可以從香港的流行文化觀出端倪。當海峽兩岸政府各自製作愛國電影如「四行倉庫」和「鐵道游擊隊」時，香港電影多是描寫社會升斗市民受到經濟壓力的生活剪影，或是荒誕奇趣的發橫財故事，音樂更有以許冠傑為代表的錢字掛帥歌曲。



不盲從政權 史觀多元化

直到一九七八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到大陸旅遊和做生意的香港人才逐步認識祖國，但要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香港人才真正的認識祖國。但就算如此，香港人也沒有把北京當敵人，這可以從多項民意調查中香港人對中央政府信任程度之高得到證明。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的馬傑偉教授曾對香港人的國家和民族認同進行調查，結果指出，香港與大陸最大的分別在於香港人沒有一個統一強大的國族意識 (National Identity)，因此個人經驗、政治立場、歷史記憶等就決定他們的取態，形成一種特殊的「港式國族情懷」。香港人整體上漸漸正面接受國族，開始重新認識中國歷史，而「港式愛國」屬於理智務實、經歷中國崛起、懂得和平爭取個人利益、靈活利用國家所帶來的功

能性好處，是一種彈性愛國的表現，不盲從政權，清楚認知「黨」與「國」的分別，接受混雜多元的史觀，而不會無條件服從愛國的道德要求，對國家意識保留彈性距離。

或許沒有政治枷鎖沒有意識形態的敵人，造成有所謂香港人沒有國家觀念的說法。在回歸議題出現之前，這個說法不無道理。但如果要有先天的敵人才可以擁有國家觀念，香港人就屬於先天性的不愛國，情形就好像很多香港人不懂為什麼「義勇軍進行曲」中這個民族永遠都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要永遠地「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中環 vs. 廣州的矛盾價值 表我真我 有段思索空白

張慧英／報導

真實的香港，和印象中的香港，差很多。

你以為像這樣一個國際大都會，應該如紐約般世故開放，可以包容各種前衛異端？你以為香港是黑社會與古惑仔的世界，男的吊兒郎當，女的風騷時髦，到處是桀驁不馴的眼神？

錯了！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真實的香港人，理性不衝動，守法守規矩。觀念傳統，對同性戀很歧視。穿著也保守，那像台灣，細肩帶、低腰褲趴趴走。這，太矛盾了吧？

「對啊，」作家龍應台說，「香港有好多矛盾，你以為它很現代化，可是他們非常歧視同性戀，道德觀非常保守，所以你要把香港和廣東一塊想。」像台灣校園近年來常在迎新時大玩變裝秀，香港就不能接受；前不久有廣播節目票選最想非禮的女藝人，也引起強烈譴責，主持人因此被解聘。

龍應台指出，所有移民社會的價值觀都是最保守的，「出去的移民都變成了一個絕緣體。」儘管外界印象中的香港，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大都會，「但它的國際化都是表層的，在技術上與國際接軌。例如他們可以做出一流的酒會、一流的廣告，使用西方語言的能力很強，但他心裡的華人文化，還是個絕緣體。」這種矛盾，龍應台形容為「中環價值 vs. 廣州價值」。

曾任上海出版局副局長、現任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的趙斌指出，在香港居統治地位的是廣府文化。英國人帶來了整個上層建築，包括政治、法律、經濟結構，也培養了一批英文佳、熟悉英國政治運作的菁英。可是走到街上，整個社會還是個廣東地方，廣府文化滲透到老百姓的生活裡。又畢竟受到中西交流的影響，變成一種「雜交的品種」。因為普通法非常重商，對交易規範很細，這種精神與中國文化結合，香港於是非常尊重法律和私人產權，相關法律也非常細膩。

被英國殖民一百五十年，又有這麼多外國人生活在這裡，香港的庶民文化卻非常傳統。雖然外國人很多，國際媒體與機構多以此為據點，但「在香港，華洋文化是不穿透的，」光華文化中心主任路平說，「這裡

華洋社會有很清楚的界線，包括華洋媒體，生活圈也完全分開，各過各的日子。」這也與殖民社會有關係，因為分屬統治與被統治階層，有高下主從的位階。

在「西學為用」的包裝下，香港有著堅固的「中學為體」。另一個原因可能在於，觀念的改變需要大量的動腦，這又非務實香港人的專長與興趣。台灣常見各種論點觀念激盪激辯，香港卻很少出現這樣的思辯。在香港的表我與真我之間，有一段思索的空白。

宛如華麗舞台 承載夢想也備受踐踏

張慧英／報導

香港，像攤開在南中國海的書，來去千百次的人以為早已了然於胸，卻懶得仔細讀一讀。

宛如一個現代化的舞台，炫麗而有效率，承載著所有的夢想與踐踏，卻沒人在意它微弱的聲音。香港是一個既受重視、也被忽視的城市。在這裡汲汲營營的人，看大陸、看全球、看台灣、看錢，就是不看香港一眼。

比起敵視批判，視而不見是更大的侮辱。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馬家輝說，有位台灣教授出任某學院院長兩年，從來不看香港報紙；有人在香港卅年，「香港與我是兩個不相干的實體，我不理香港，香港不理我。」余光中十年看山，沒看見山，看的是山後故土。

兼任《明報》副刊主編的他，去年費了好大的勁，拿到張愛玲一篇從未曝光的文稿，刊登後文人紛紛在兩岸發表評論，但就是沒有一篇在香港發表。馬家輝不滿地說：「這些教授在香港住了廿年，還是不理會這個地方。對他們來說，香港只是一個住的地方，多寂寞啊！」

香港很容易被忽視、被誤解，一方面也是因為港人「沒認識自己、描述自己的能力」，龍應台說。多少年來，香港一直被習慣性地輕視，那個彈丸之地、文化沙漠，有什麼了不起？

外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造就了中國人自己從不曾達到的繁榮、法治與秩序，也對照出了中國文明的落後。國土的割讓是百年國恥，而這個國恥居然比祖國更繁榮先進，更是咬嚙著脆弱的民族自尊。

孫中山在港大演講時曾問道，為什麼中國五千年文化做不到香港這樣的社會，英國人幾十年就做到了？「所以大家一方面看到香港的先進性，一方面看不起香港，不承認香港的先進性，認為我們是殖民地的孽種……這是原罪吧？」《明報》政論專欄作家洪清田感嘆地說。

但在脆弱的自尊之下，也潛伏著對西方文明自愧不如的自卑；而認為中國必須改革的人，又拿香港作為西方體制優越證明。於是都將香港歸功於外人，同樣不把港人的努力當回事。

其實，沒有許多人的認真打拚，再高明的殖民者也不可能創造奇蹟。七百萬兢兢業業的香港人，工作時數及通勤時間都名列全球前茅，他們的勤奮與成果，一直得不到應有的評價。到了回歸邁入第十年的現在，外界更是輕易把香港表現與中國畫上等號，港人自己的付出被一筆抹煞。

香港人活得實際，不會想那麼多有的沒的。公允也罷、錯待也好，對生存發達重於一切的香港人而言，都像雲端的高調。無論被殖民還是回歸後，香港一直是個特異的城市，也永遠將保持某種程度的異質性。但百年歷史因緣際會留下的印記，只是特異的斑紋；香港真正的生命力，是藏在那幾百萬人的拚勁與求生意志裡。

政商親中 傳媒言論漸失多元性

張慧英／專題報導

比較回歸前後，香港的言論自由，是緊縮了。在言論尺度與意見多元上，都呈現了退步。原因一是回歸帶來的政治大環境變化，二是《蘋果日報》的出現，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媒體更趨商業取向。

公民黨主席關信基指出，八〇年代《蘋果》出現以前，香港報紙還有報人風格，意見多元，社會關懷也很深，意識形態則是左、中、右三分天下。後來右派慢慢消失，報紙的意識形態逐漸緊縮並趨向一元，而且愈來愈親中，九七之後速度更為加快。此外，媒體也走向商業掛帥，為追求利潤迎合普羅大眾的口味。

新聞處理 無意識自我約束

「說香港沒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也不是，它是在各種力量中慢慢操作變動，像野生動物園，管理員有的穿制服有的不穿，動物可以隨便亂跑，但有些禁區不能碰，例如台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朱立說。

回歸後出現了一些結構性的變化，「最根本的是宗主國變成中國，而中國的言論尺度如何，大家都知道。」朱立說。其次是很多媒體因為商業利益倒向中共，例如與大陸有直接關係的財團買下媒體，或者老闆在大陸有生意，言論市場原有的多元性已經退步了。

倒不是說有人會指揮新聞處理，朱立指出，媒體在言論尺度的操作上，比較是受到心理層面的影響，而這種「自我約束」有時甚至是無意識的。

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馬家輝舉例：曾有電視台來訪問他，桌上擺了幾本和陳水扁有關的書，但攝影就是不拍它們。「我不認為主管會先交待，這是記者自動的過濾。」但現在電視還有播台灣新聞，法輪功也在街上發傳單，所以馬家輝認為，新聞自由「最關鍵的地方，該有的都有，有些東西還是保存下來

了」。

現在媒體罵特區政府沒問題，批評中共的話就要拿捏一下力道，或者跟在《蘋果》之後。比較起來，《蘋果》鮮明的反共立場獨樹一格，宣洩了很多人對中共的不滿。除了基於經營者的意識形態外，「反共在香港還是有市場」，城市大學講座教授李金銓說。「有市場，但沒前途」，朱立則說。

台灣媒體對民主化扮演重要角色，但香港報紙少見這樣的使命感。公民黨議員吳靄儀就覺得言論自由在走回頭路：「九七以後，攻擊我們的負面消息愈來愈多，愈來愈明目張膽。我們的論點沒人登，反而罵我們拖延議事、別有用心。推動民主，傳媒不是我們的朋友！」

媒體容易受到商業利益牽制，不過朱立認為，市場競爭也使得媒體不能完全抹殺事實，「有兩萬人上街你就不能說沒人」，所以市場還是一個保障新聞自由的機制。而且媒體對政治發展還是有影響力，否則廿三條不會擋住。李金銓則指出，香港報紙對民主的角色不在推動，而在確保「透明度」，讓問題無所遮掩。

市場機制 反保障新聞自由

本地雜誌沒有提供更多的深度，以前的政論雜誌是兩岸一扇自由窗口，但年輕人不愛看政論，《九〇年代》之類的政論雜誌也一個個關了。

香港人文字能力較弱，電視的言論尺度保守，政治意見於是以廣播為主要場域。然而一年前，人大代表李鵬飛等三位經常批評時政的名嘴被迫關掉節目，後繼無嘴，廣播的批判火力從此大減。

李鵬飛認為，當時董建華被批得片甲不留，眼看立法會快選了，北京擔心選情一面倒，所以要控制電台，而電台沒辦法不接受政治壓力。他索性拒絕接受懇談，並且關掉節目。「他控制不到言論的，但並不是不想控制。」至今仍堅持有話直說的李鵬飛說。

雖然有些退步，但香港基本的言論自由還是保留下來了。在西環中聯辦大樓的對面，靜坐著唯一一群可以在中國土地上自由活動的法輪功成員。而橫亙在二者之間的，是兀自熙來攘往的香港街道。